

起来！中国胜利了

〔奥〕富华德 严斐德著

张至善编 张至善 王燕生等译

北京师范大学



“西班牙医生”在中国·为纪念国际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

国际友人丛书

起来！中国胜利了

——“西班牙医生”在中国

张至善编/张至善、王燕生等译

纪念国际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60 号

责任编辑:胡建祥 封面设计:李 强

责任印制:马洪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起来!:“西班牙医生”在中国/(奥)富华德(Freudmann, W.)
著;张至善译. 中国胜利了:“西班牙医生”在中国/(奥)严斐
德(Jensen, F.)著;王燕生、张至善等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1994. 9

(国际友人丛书/爱泼斯坦, 高梁主编)

ISBN 7-303-03686-5

I. 起… II. ①富… ②张… ③严… ④王… ⑤张… III. 回
忆录-抗日战争-奥地利-现代 IV. I52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9343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875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字数: 337 千 插页: 10

199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500 册

定价: (平) 14.00 元
(精) 18.00 元

《国际友人丛书》总序

在我国首都和地方一些外文出版社的共同倡议下,《国际友人丛书》即将陆续出版问世。这是我国出版界为更多地介绍国际友人而作出的尝试,也是很有意义的一次创举。对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翻开中国近代史,在各个时期里都有大批国际友人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进步事业。他们有的不顾个人安危,直接投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洪流;有的冒着风险,积极支持或参加中国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有的渴求真理,公正地介绍中国实况,赢得了国际上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援;有的呕心沥血,忘我无私,把一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中国人民。新中国成立以来,又有大批友人为中国的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而勤奋工作,奉献才智。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有的甚至光荣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像灿烂的群星,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闪烁着永恒的耀眼的光辉。

他们是各国伟大人民的优秀儿子和卓越代表。虽然在国籍、肤色、语言、专业上各不相同,也各因不同处境而与我们的看法不尽一致,但是,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同情和爱戴中国人民,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并能为此作出贡献而感到光荣。中国人民因有这么众多的国际友人而自豪。他们的深情厚谊和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像雨露和阳光,使我们从中汲取着前进的力量。

在这些国际友人中,不少人留有自己的著作,包括自传、日记、书信等;也有中外作家、学者、亲朋好友所写的关于他们的

传记或回忆。这些著作大都记载了他们个人在中国的经历和生动感人的事迹；体现着他们的高尚品质和情操；反映了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切情谊和期望；同时也记录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以及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在寻求民族解放和人类进步的道路上所创造的史诗般的业绩。其中有些已被世界公认是了解中国近代史必读的名著。无疑，这是国际友人留给我们后人的巨大的精神财富。

在中国，这些著作曾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在 30、40 年代，大批中国青年是在阅读了其中一些著作后而走上民族解放和革命的道路；新中国建立后，这些著作又激励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然而，这些著作中，有的因年久而已失传或绝版；还有不少著作尚未翻译出版，为中国广大读者所不晓；许多国际友人未留有著作，但关于他们的事迹却流传不少；尤其是那些如今健在而已年近古稀的国际友人，他们仍保有不少资料急待加以整理。因此，发掘整理这些资料，编辑出版这些著作，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

抱着这种责任感和紧迫感，由各有关出版社的社长、总编、副总编和一些中外专家组成了《国际友人丛书》编辑委员会，其目的是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和发行。这套丛书将以国际友人的传记为主，也包括他们的一些代表性著作，除中文版外，还出版一些外文原著。我希望编委会经常同作者、译者、中外朋友和广大读者们保持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以便能够集思广益，发掘选题，确定书目，保证出书质量，向中外读者提供更多的介绍国际友人的著作。

今天，全国人民正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发前进。编辑出版国际友人的著作，介绍他们的光辉业绩，发扬他们的高尚品质和献身精神，不仅对国际友人是种纪念和慰藉，对国外广大朋友是种鼓舞，而且对于我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更

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我相信，当我国青年一代读到国际友人这般热爱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事迹时，一定会激发出更加巨大的爱国主义热情，更加坚定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当读到这些著作中关于中国革命艰苦而光荣的历程时，一定会更加珍惜中国革命前辈用生命和血汗创造的业绩，更加发扬艰苦奋斗、勤劳创业的革命传统；而国际友人的无私奉献的国际主义精神，更会启发我们青年一代广开眼界，培育高尚情操，树立远大理想，把自己同可爱的祖国和广阔的世界联系起来。

我想，《国际友人丛书》的出版，也是为了表达我们长期以来对这些国际友人的无限感激和永恒的思念。没有这些国际友人的支援，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难以取得如此伟大成就的。

祝愿国际友人们的伟大精神永放光芒！祝愿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古长青！

黄 华

1990年9月

序

在中国人民和其它国家人民之间相互支持的历史中有一个颇有意义的篇章，即有关从西班牙内战时的反法西斯前线，转到中国抗击日本侵略者前线的一批志愿医务人员的活动。他们在1939年来到中国，留在中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其中有些人留的时间还更长些。现在这本译著就是这富有意义的事件中严斐德（Fritz Jensen）和富华德（Walter Freudmann）二人的著作，它是个会受欢迎、十分需要的能引人回忆的作品。

说这是一本十分需要的能引人回忆之作，不仅因为它是记载外国友人史料的一部分，也因为它包含了一段老年读者都知道而年轻读者不一定知道，但又应该知道的史实，这就是：中国为民族存亡而进行的生死斗争乃是世界范围反法西斯斗争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是国内外为自由、进步而斗争的战士们都深刻感受到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过一点特别体现在当时仅有的中国和西班牙的两个军事战场上。

优秀的西班牙人民曾抗击过以反动军阀佛朗哥为首的反革命势力，这股势力有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作后台，中国人民则长期在抗击日本穷凶极恶的进攻，尽管有反动的亲日分子的反对和干扰。这两个战线在地理上虽远隔千里，但他们的战士们却强烈地感受到他们是在肩并肩地战斗着。在马德里，西班牙共和政府的保卫者们都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而在1938年的武汉和延安，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向战斗中的西班牙人民致以同情的表现。在延安的窑洞之间，人们可以看到写着当时西班牙流行的口号标语“NO PASARAN!”（即：[法西斯]过不去!）和听到《保卫马德

里》的歌声。

在国际上，西方列强当时对日、德、意-法西斯轴心国家妥协：美国向他们出售石油、废钢和其它军用物资，这些军用物资以后反被用来打他自己。同时，西方国家在轴心国实际上已经在干涉的情况下，还以所谓的“不干涉”政策来否决向被围困的西班牙共和政府提供军火。只有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尽其力所能及地帮助中国和西班牙，他们的援助也限于当时较低的物质发展水平和自身防务的需要。

许多不同国籍的进步分子——其中包括诺尔曼·白求恩医生(Dr. Norman Bethune)都涌集到被称为〈国际纵队〉的志愿军中去参加保卫西班牙共和政府。一些人直接参加战斗而牺牲在战壕中，另一些人进行过战地医务工作，其中就有白求恩医生。他们中也有后来到中国被称作“西班牙医生”的一批医务人员，虽然他们属于不同国籍——德国、奥地利、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俄罗斯，但他们全是自愿去援助抗击法西斯的。许多人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年轻共产党人，因受他们的法西斯或近于法西斯的政府迫害而背井离乡。

1939年，西班牙共和政府失败后，他们一度被监禁在邻近的法国集中营中，但他们不认为自己反法西斯的斗争已经结束，因此他们为到远东战线上继续进行斗争而来到中国。通过一个英国进步组织的介绍，他们在香港受到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接待。他们渴望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先锋队——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去工作。然而，由于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内部磨擦日益加深，国民党当局不许他们去。他们很快就和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代表周恩来同志建立了联系，在他的劝说下，他们就在国民党军队中，由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派遣，进行整个战时的医务服务工作。

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才去过解放区。⁴⁰

年代后半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大部分人回到自己的国家。严斐德在中国的时间最长，并留下最完整的经历记录。解放后，他作为作家、德语专家又来到中国。1955年，他随中国代表团和一些中外记者乘坐印度民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赴万隆参加著名的亚非会议途中，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破坏而坠机遇难。和当时牺牲的其它烈士一样，他的名字也铭刻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墓碑上。

其它从西班牙来的医生以后也都杰出地为其本国人民服务，例如捷克籍的柯理格医生(Dr. Kriegel)作过本国的卫生部长，其它医生也做过各种负责工作。他们一直保持着与中国友好，许多人还重来访华。当年在中国的队长傅拉都医生(Dr. Flato)曾在北京数年，担任波兰外交官员；当年曾任副队长、保加利亚籍的甘扬道医生(Dr. Kaneti)，也是少数健在者之一，在他八十高龄时还到中国来旧地重游。

能让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人知道自己国家和人民最好的朋友乃是那些出于无私的动机，愿意使自己和受侵略及受压迫的国家共命运的人们，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人民的友谊不是抽象的，而是强有力的振奋力量。

“西班牙医生”们就具有这种精神和实际行动。

我很自豪，认识他们中的许多人，并和他们成了朋友。我也很高兴，现在能写这些话来介绍这本书，它实际上是两本由严斐德、富华德写于几十年前而呈献给当今中国读者的书。

爱泼斯坦(W. Epstein)

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副会长

1992年4月22日于北京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的“西班牙医生”

抗日战争期间，从1939年秋到1945年战争结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中活跃着一批被称作“西班牙医生”的国际友人。这批国际友人是：

德国的

贝尔医生 (Dr. Herbert Baer)
白乐夫医生 (Dr. Rolf Becker)
顾泰尔医生 (Dr. Carl Coutelle)
马库斯女士 (Ms. Edith Markus)
王道医生 (Dr. Wantoch)

波兰的

傅拉都医生 (Dr. Szmuel-Moysze Flato)
戎格曼医生 (Dr. Wolf Jungermann)
甘理安医生 (Dr. Leon Kamienecki)
甘理安夫人 (Mrs. Mania Kamienecka)
陶维德医生 (Dr. Wictor Taubenfligel)

奥地利的

富华德医生 (Dr. Walter Freudmann)
严斐德医生 (Dr. Fritz Jensen)
肯特医生 (Dr. Henryk Kent)

罗马尼亚的

杨固医生 (Dr. David Iancu)
柯让道医生 (Dr. Jasul Kransdorf)
柯让道夫人 (Mrs. Kransdorf)

捷克斯洛伐克的

柯理格医生 (Dr. Franz Kriegel)

基什医生 (Dr. Fredrick Kisch)

保加利亚的

甘扬道医生 (Dr. Ianto Kaneti)

匈牙利的

沈恩医生 (Dr. George Schoen)

苏联的

何乐经医生 (Dr. Alexander Volokine)

英国的

高田宜女医生 (Dr. Barbara Courtney)

从国籍上看，这些国际友人虽然都是欧洲人，但其中没有一个是西班牙籍的，为什么却被称作是“西班牙医生”呢？原来，这些国际医务工作者中除英国的高田宜女医生是自己从印度来到中国参加救护队工作的以外，其余的人大都参加过 30 年代的西班牙反对佛郎哥、保卫共和之战。共和政府失利后，他（她）们离开西班牙，有的在法国被关进拘留营，有的远走英国避难，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他（她）们本着反法西斯的决心，响应当时由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呼吁，由“国际援华医药委员会”出面组织，经英国及挪威的援华委员会安排，分批来到中国。他们来到香港时，被当时香港报纸称做“西班牙医生”。就这样，“西班牙医生”的称号就成了这批国际医务工作者的头衔了。

在香港，这批国际友人受到宋庆龄的接见和款待。他们提出要到共产党领导的战区工作。由于当时形势的复杂性和需要，宋庆龄介绍和安排他（她）们到贵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工作。他们一到贵阳，便要求到抗日战争的前线开展战地救护工作，以便

减少由于长途运输造成的伤病员死亡。这样，他们就被编到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护总队中，他们没有成立单独的组织，而是分散到各个中队或分队去，并根据他们从事医务工作的经验，有的被任命为中队的队长，有的担任分队队长。他们分头到达指定的地点工作，并且根据总队的命令，哪里需要就随时调到哪里。因此，他们的足迹曾遍及贵州、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等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几个省份，而且一干就是好几年。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统治区，民生凋蔽，物资匮乏，吏治腐败，这批国际医疗人员所在的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只是一个非国民党政府官方的组织，得不到官方的重视和资助。在这种条件下，对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的外国人，适应生活环境，生活下去就是第一个难题。这些具有坚强反法西斯决心和崇高国际主义精神的国际友人没有被困难压倒，他们不自视特殊，没有要求特殊待遇，而是同中国工作人员一样，住茅草屋，睡竹板床，吃糙米饭，穿红十字会救护队的制服，到各地工作时，遇到没有交通工具的地方。也靠两脚步行。简单地说，他（她）们真正是同中国人民同吃、同住同行动。

比起生活条件来，工作条件更为困难。他们刚到贵阳，救护总队中就流传着对他们不利的风言风语。他们不懂中国语言，很难同普通中国人交流。在物质方面，救护工作需要的病房、手术室、药品架等基本设施都不具备，幸好中国南方到处有竹林，经他们建议就可以就地取材，用以修建。当时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药品医疗器具依靠国际和爱国华侨的捐赠，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救护机构中算是充足的，但要完全满足前线救护工作的需要，还是不够的，一些药剂救护用品仍要各救护中队、分队自己动手制作解决。救护人员不足，人员素质又差，也要他们自己动手编写教材进行训练培养。最麻烦的是由于国民党政治腐败，士兵给养常被克扣，士兵营养不足，军中卫生条件极差，疾病流行，因此造

成非战斗减员远远超过前线伤亡人数。救护队要花很大力气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要从改善军中的卫生条件作起，改变饮水习惯，改造厕所，建造洗澡设备尤其是灭虱工作，它是预防回归热等流行病的主要措施。他们自己动手，制造出洗澡和灭虱器具，发明有效的治疗回归热的办法。这些还都容易，最困难也是最关键的是要推行这项工作必须取得各级军官的同意，他们不仅要具体的公共卫生工作，还要做军官们的说服疏通工作。为了实现一个合理化建议，救护队中的国际友人不知和国民党军官发生过多少次争论磨擦，遭受过多少次精神折磨和排挤，而许多建议仍然不能实现。

不管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多么艰难困苦，这些国际友人把自己当作中国人民中的一员，表现出对中国人民的高度友好。他们到中国后不久，每个人都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本文在开始时所列出的名单，就是依据他们当时所用的中文姓名，而不是通常的译名。他们关心中国战局的发展，他们中的共产党员自己编了两个小组，分别由傅拉托医生和甘扬道医生负责，同中国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取得直接联系。当时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的王炳南、陈家康同志就和他们多次会晤。他们不仅从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了解中共对时局的看法分析，还把从个人不多的收入中节余下来的钱捐赠给中国共产党。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他们还直接会见过周恩来同志，向他提出到中共战区工作的要求，周恩来为他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向他们解释在国民党战区工作也是为抗日战争服务的道理，希望他们在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安心工作。他们接受了周恩来的劝告并照着做了。救护队原来只为军队服务，但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也尽量为驻地居民看病治疗。这些国际友人把自己最好的青春献给了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的斗争，直到战争胜利他们才陆续返回自己的祖国。其中有几位国际友人甚至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像英国女医生高田

宜1940年在贵阳病逝；罗马尼亚女化验员在艰难的工作条件下染上了回归热，1943年在昆明去世；德国医生王道1945年在重庆去世；奥地利医生严斐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以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对新中国的建立和中朝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做了大量报导，在1955年4月赴印度尼西亚采访万隆亚非会议途中，由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和同机的中国工作人员一道遇难。

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半个多世纪了。中国人民对处在困难的时候援助过自己的国际友人永远不会忘记，被称做“西班牙医生”的国际友人的业绩一直在中国人民中传颂着。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中抗日战争部分陈列着这批国际友人的名单，它是曾参加过西班牙反弗朗哥战争的共产党员谢唯进同志生前交给党组织的遗物。芦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也陈列有这批国际友人的部分照片。在贵阳图云关森林公园中，也就是当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旧址上，在1985年耸立起一座刻有这批国际友人姓名的折页形纪念国际援华医疗队的石碑，埋葬在这里的英国女医生高田宜的墓地也得到了重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阳市委员会1987年编印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红会救护总队》中，有多篇文章记述了这批国际友人在救护总队中的活动和作者们同他们的友谊。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也多次邀请这批国际友人中能够联系到的朋友，如德国的白乐夫医生、顾泰尔医生、罗马尼亚的杨固医生、保加利亚的甘扬道医生重来中国访问作客，每次他们来访，中国传播媒介都作了报导记录。这些国际友人中的东欧国家友人由于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战区工作，而在各自的国家中曾遭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中国党也出面负责向他们的党组织做了必要的澄清工作。

这次张至善教授等人将收集到的曾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工作过的两位奥地利医生——富华德和严斐德——早年旧作翻译

成中文，汇编出版，也是为了表示中国人民对曾经在困难时期援助过自己的国际友人的永远怀念。富华德医生写的《起来！》是他从中国回国后对在中国参加抗日战争经历的回忆录，从中人们可以了解到许多有关这些被称做“西班牙医生”的国际友人在中国工作的具体情况。严斐德医生的《中国胜利了》是他通过自己对新旧中国的亲自考察对比写出的研究著作。从这两部著作中可以让人们看到这些国际友人对中国人民是如何的热爱和对中国人民的前途又是充满了何等的信心。两本著作都会给读者带来许多教益。

祝中国人民和国际友人的友谊长存！

张辛民

新华社高级编辑

原参编部主任

1992年3月1日

目 录

《国际友人丛书》总序	黄 华 (1)
序	爱泼斯坦 (1)
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的“西班牙医生” ...	张辛民 (1)

起来!

——一个医生于 1939—1945 年在中国的经历

告别了欧洲	(3)
黑礼服与花布衫	(4)
再一次见到西班牙	(6)
通往亚洲的门户	(8)
异国风光	(10)
马来西亚的魔力	(13)
战争爆发了	(14)
在香港	(15)
宴请	(17)
和孙逸仙夫人在一起	(20)
在重庆着陆	(21)
一次乘人力车之行	(24)
拜访宋夫人	(26)
中国的军事形势	(27)
到贵阳的路途中	(28)
到达贵阳了	(30)

失望的接待	(32)
样板医院	(34)
吃饭的习俗	(35)
一个有趣的相识	(36)
我们同志们的到来	(37)
进城去	(39)
时代的冲突	(41)
傍晚的奇遇	(42)
盗窃案	(44)
我们为赴前线而斗争	(46)
到前线去的途中	(48)
在中国的大道上	(49)
又一个模范医院	(50)
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52)
徒步进军开始了	(54)
河中乘船划向上游	(56)
到达长沙	(56)
新的困难	(57)
中国将领	(59)
到达目的地	(61)
师部医院	(63)
谈天也是工作	(64)
做生意和战争	(65)
病房的女护理员	(67)
没有伤员的战役	(69)
竹棍子	(71)
一个政治教导员	(73)
召见	(74)